

引用格式：

高小玲, 王宇婷, 晋洪涛. 政策工具与渔民韧性的适配性如何影响退捕长效机制构建? ——基于 fsQCA 的分析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4): 691-701.

Gao X L, Wang Y T, Jin H T. How does the adapt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fishermen's resilience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for fishing withdrawal? Based on the fsQCA configuration analysi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4, 45(4): 691-701.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0221



政策工具与渔民韧性的适配性如何影响退捕长效机制构建? ——基于 fsQCA 的分析

高小玲, 王宇婷, 晋洪涛*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评估的目标是实现退捕渔民生计与渔业资源恢复间的平衡。渔民的意向性和生活幸福度应当成为衡量禁渔效果的重要标准, 研究退捕政策与渔民特性的适配对构建退捕可持续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湖南省 11 个县(区、市)的 369 位退捕渔民为案例,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 从韧性治理视角探索渔民韧性、政策工具对退捕政策长期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1) 结合南县、湘阴县及沅江市的典型经验, 提炼出积极态度-网络协作、学习能力-职业培训、网络协作-产业帮扶和学习能力-网络协作-政策联动 4 类不同主导型的政策长效组态。第一类强调渔民主观能动性, 第二、第三类探索渔民韧性与政策工具的适配性, 第四类挖掘政策组合的实效性。2) 网络协作与学习能力是导致政策高效与低效组态的关键变量, 验证了二者通过强化渔民韧性提升政策效果的重要性。3) 职业培训和产业帮扶政策为巩固退捕长效机制打下基础, 生态补偿与社会保障均为辅助条件, 治理效果有限。由此提出重视社会网络支持、加强农村学习氛围营造、探索因地制宜政策组合的建议。

关键词: 长江十年禁渔; 渔民韧性; 政策工具; 政策长效机制;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2024)04-0691-11

How does the adapt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fishermen's resilience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for fishing withdrawal? Based on the fsQC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GAO Xiao-ling, WANG Yu-ting, JIN Hong-t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evaluating the “10-year fishing ban”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is to balance the needs of retired fishermen with the recovery of fishery resources. Key metrics for evaluating the policy include fishermen's intenti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vestigating the adaptation of fishing ban policy to the needs of fishermen is essential for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long-term mechanism. This study examines 369 retired fishermen from 11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fsQCA),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fishermen's resilience and policy tools o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fishing ban policy from a resilienc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ased on the typical experiences of Nanxian County, Xiangyin County, and Yuanjiang City, four different dominant types of long-term policy configurations are identified: positive attitude-network cooperation, learning ability-vocational training, network cooperation-industry support, and learning ability-network cooperation-policy interaction. The first configuration underscores fishermen's subjective initiative, while the second and third configurations investigate the alignment between fishermen's resilience and policy tools, and the fourth configuration asse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combinations. 2) Network cooperation and learning ability are key variables leading to both efficient and inefficient policy configurations, highlighting their importance in enhanc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by strengthening fishermen's resilience. 3)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serve as foundational elements for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long-term fishing withdrawal mechanism, whi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re auxiliary conditions with limited governance effects. Therefore, the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02-25;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4-05-3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YJA790017);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0BGL03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GL210)。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21YJA790017); Topics of Shangha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lanning (2020BGL033);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3BGL210).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htjin@shou.edu.cn)

study suggests prioritizing social network support, enhancing the rur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xploring localized policy combinations.

Key words :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for ten years; fishermen resilience; policy instrument; long-term policy mechanism;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是国家从强调生产效率转向优先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创新。自政策实施以来,长江“四无”(无捕捞渔船、无捕捞渔具、无捕捞渔民、无捕捞生产)目标完全实现,水生生物资源增加,生态效益显著,但也彻底改变了渔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国务院办公厅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和“重点水域禁捕”作为重要任务共同推进。然而,自上而下的“十年禁渔”政策效果如何?政策效果评估应纳入符合政策目标的形式标准和保障公平的实质标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参与者的意向性对制度变迁起关键作用。2021—2022年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组织的退捕渔民跟踪调查显示,湖北、湖南、江苏的受访渔民长期退捕意愿明显下降,贵州和江西的渔民不返捕意愿虽上升但仍处于低位。长江退捕效果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公共政策领域的新进展是强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策实施对象紧密联结^[1-3]。因此,研究宏观政策与微观渔民的适配对提升退捕政策效果和构建可持续禁渔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十年禁渔”政策研究主要围绕渔民退捕政策满意度及其成因^[4-6]、不同政策类型及其对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等^[7-10]。少有文献关注多元化政策工具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适配性,且政策执行成功标准单一,通常停留于形式标准如政策满意度。形式性标准如长期退出捕捞与举报非法捕捞意向直接影响长江“四无”治理成效,实质性标准如渔民生活幸福度则决定政策执行的正义性。退捕渔民的意向性和生活幸福度应成为“十年禁渔”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禁渔新规则切断了渔民原有捕捞生计来源,迫使他们转产就业。渔民个体良好的决策和资源获取机会增强了其在复杂环境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类抵御风险和逆境的适应能力即为渔民韧性^[11-12]。政策工具的实施作为制度冲击的缓冲器,可以支持渔民提升适应能力,即提高韧性。韧性治理理念聚焦社会关系视角,整合外部物质结构与农民韧性概念^[13],通过研究宏观外部环境 with 微观个体韧性的互动关系,实现乡村社会风险和贫困治理的可持续发展^[14-18]。综上,长江退捕政策长效机制的形成应基于渔民完全退出重点水域捕捞的强烈意向,并将生态优先的形式标准内化为具体行动。渔民韧性与外部制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这种意向性。

区别于以往文献,本研究:一是运用形式标准(长期退出捕捞或举报非法捕捞意向)和实质标准(退捕渔民生活幸福度)共同评估政策实施成效;二是鉴于韧性治理对整合内外部力量^[13]、实现政策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16-18],引入渔民韧性概念,归类县域政策工具,聚焦分析退捕效果的政策工具与渔民韧性的适配性;三是退捕渔民意向是受个体与情境因素协同影响的过程,需用多元、整体视角来审视治理过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能够挖掘前因复杂性,突破计量回归探索单因素净效应的局限^[19-21]。综上,探索渔民韧性、政策实施工具影响退捕政策效果的组态类型,总结成功推行禁渔制度的县域经验,能解决政策工具与异质性对象的激励相容问题,理论上也能丰富制度变迁理论和韧性理论,为“十年禁渔”后续完善提供参考,也为珠江、黄河流域乃至近海生物保护中“鱼进人退”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1 理论模型构建

“十年禁渔”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大改革,要求决策者跨领域制定政策以解决问题^[22]。这些政策通常缺乏基线衡量标准,因果关系模糊,实施背景具有动态调适性^[2],政策工具路径的改变将影响最终结果。政策评估涉及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是个体行动的核心动力。作为退捕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渔民与渔业资源恢复间的平衡是评估的最终目标。后实证主义者关注政策的社会效益与潜在价值^[2],因此,将渔民长期退捕、举报或阻止非法捕捞行为纳入政策评估,同时考虑渔民生活幸福感,丰富了多元主体利益的评估视角。

政府主导的农业绿色工程配套援助计划和支持政策,包括补偿、保障和帮扶等措施,作为制度冲击的缓冲器,增强了渔民家庭和个人的抗逆能力。多元化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影响退捕成效,而渔民韧性的异质性则带来施政差异。退捕政策成效受渔民个体和外部制度因素的联动影响。韧性治理整合微观个体和宏观外部因素,构建了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关注外部制度结构和农户韧性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13-15]。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根植于组态思维,旨在解构因果复杂性,能够挖掘多层面前因条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机制^[19-21]。因此,本研究采

用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的实质性标准，以及长期退出捕捞意向、阻止或举报非法捕捞意愿等形式标准，

评估长江退捕政策成效，并通过QCA方法探索政策工具和渔民韧性匹配组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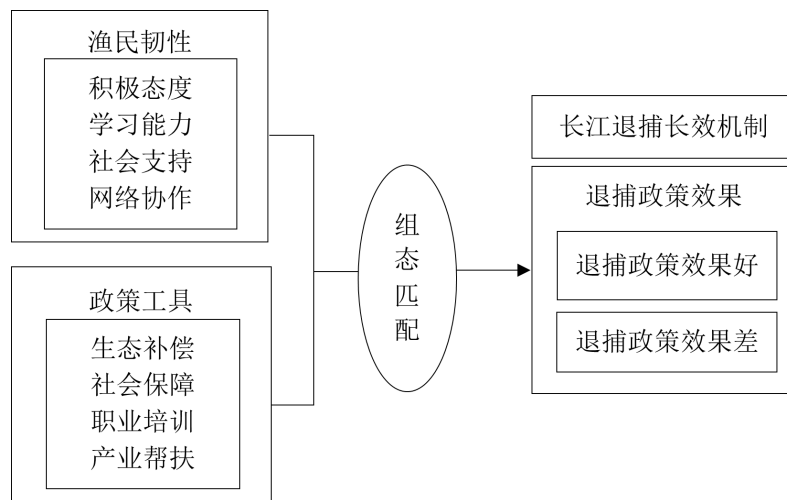


图1 长江退捕长效机制理论模型

Fig. 1 Analysis model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fishermen's withdrawal from fishing

1.1 渔民韧性

韧性关注复杂系统的抗压、复原及可持续发展能力^[23]，在个体层面衍生出家庭韧性概念^[25]。农民韧性强调整合物质结构和社会力量，提高抵御农业政策变革风险和适应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11, 13, 24]。参考现有文献^[11-13, 23-25]，本研究将渔民韧性定义为在禁捕风险冲击下，渔民依靠个体与家庭结构力量，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并通过调整、适应与重建生活来应对挑战的能力。本研究基于Walsh家庭韧性模型和FRAS量表，通过积极态度、学习能力、社会支持及网络协作四个维度来衡量渔民韧性。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了渔民应对禁捕政策带来挑战的能力，从而支持政策的长期效果。

1) 积极态度。渔民对退捕的正面评价能形成缓冲，减少脆弱性和后续问题的风险^[25]。退捕改变了渔民的生计方式，评价越正面、未来预期越好、越坚信政策兜底、再就业动机越强烈，渔民越会参与培训提升就业能力，退捕后更能增收，从而实现长期退捕。

2) 学习能力。农户的学习意识与能力和“干中学”环境对农户绩效水平有促进作用^[26]。学习能力强的农户能更好地将技能转化为实践能力，提升自我发展^[27]。持续学习能力有利于渔民处理退捕后各类事项，获取政策信息并提升就业素质，适应新生计实现长期退捕。

3) 社会支持。凝聚力强的家庭关系促进成员间沟通和应对，提供社会资源缓冲风险^[28]。良好的社会关系帮助预防风险，提供有效求职信息，增加

职业选择和获得高报酬的机会^[29]。同类群体中社会支持较高的渔民，能获得更多就业帮助，节省信息搜寻成本，提升获取新技能、适应新情境的可能，便于实现生计转型。

4) 网络协作。农户与亲友邻里、专业人士交流协作形成的异质性网络，对其采用新模式和技术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30]。个人高度依赖现存的个人网络来获取工作变动机会的信息^[31]。网络协作紧密度越高、异质性越强，意味着渔民人际网络资源整合素养较高，在遭遇变故时越能主动寻求帮助，整合信息和人脉寻找和维持新生计。

1.2 政策工具

韧性治理体系体现出时间和地域差异^[17-18, 32-33]。根据贫困治理的不同阶段，政策目标依次推出产业、保障与帮扶政策^[32]；在农村共同富裕的地域治理差异上，中西部地区强调“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而东部沿海则更强调文化、生态等要素^[33]。各地方基于本地渔民特征在政策实施中会有所侧重。政策实施的次序上，退捕前三年重点是船网证回收、生态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后期则转向转产就业、产业帮扶等。退捕政策工具可以分为生态补偿、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和产业帮扶。

1) 生态补偿。禁捕补偿采用“地方为主、中央奖补”的财政补助方式，包括渔船及工具拆解、渔具、捕捞许可证回收补偿、提前退捕奖励与过渡期生活补助等。现金补贴等操作简单、成本低的方式对于生态补偿的有效性至关重要^[9-10]。政策性生态补偿为渔民提供了两年的生计过渡期，在“择业

期”内确保了渔民的生计来源，对部分缺少劳作能力或就业意愿不强的渔民起到了临时补助和情绪安抚的作用。

2) 社会保障。通过兜底建立最低工作标准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32, 34]。各地落实渔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等，将符合条件的渔民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供养范围。该政策兜底保障底线，让健康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渔民群体能通过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生计，间接抑制返捕行为。

3) 职业培训。通过技能培训和介绍就业岗位等手段，拓宽就业渠道，激发参与退捕的积极性，促进渔民转产。这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渔民生计策略，还通过影响其可利用的生计资本改变生计策略^[8]。对积极就业的渔民，职业培训提升了就业技能的方式和能力。

4) 产业帮扶。强调定向转移支付和精准帮扶对接，以此实现公平^[32]。通过动态帮扶，提供养殖、务农技术指导和创业金融支持等，帮助解决生活就业困难。产业帮扶面向高适应能力、高接受能力的渔民群体，通过提供精准支持，大幅提升退捕收入，推动作业方式的绿色化市场化转型。

2 研究设计

2.1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长江退捕政策效果受渔民个体与情境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同韧性的渔民依托各类政策工具加快适

应制度变革，政策实施者则根据渔民异质性和行为调整政策工具。这种动态互动导致政策成效中的因果不对称和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问题。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优势的定性比较分析(QCA)能够解决此类问题^[19]。fsQCA尤其适合本研究，理由有二：一是fsQCA处理非线性因果对称关系及复杂前因变量更具优势，能够捕捉前因变量对政策效果的不同影响；二是可处理类别归属和程度连续变化问题，本研究数据采用Likert 5点量表测量，所有前因条件为连续型变量，fsQCA更能捕捉前因条件对结果的细微影响，适合归纳不同渔民特征下有效政策组合。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21年对湖南省汉寿县、安乡县、南县、沅江市、赫山区、桃江县、湘阴县、汨罗市、君山区、临湘市、浏阳市11个县(区、市)的实地调查。湖南省退捕渔民数量在全国退捕省份中位居第三，且退捕所涉及的县域范围较广。因此，湖南省的渔民样本和县域政策实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11个县(区、市)共发放退捕渔民调研问卷387份，筛选后有效问卷共369份。本研究的前因变量数为8，369个样本量满足QCA分析样本量的最低标准，即样本量达到128即可^[35]。

2.3 变量测量与信效度检验

2.3.1 结果变量 退捕政策效果选取“长期退出捕捞意向”、“阻止/举报非法捕捞的意愿”作为形式标准，以及“退捕后渔民生活幸福感”作为实质标准共同衡量，具体测量标准见表1。

表 1 结果变量测量

Table 1 Outcome variable measurement

结果变量		测量标准	
退捕政策效果	形式标准	长期退出捕捞意向	1=肯定不会；2=可能不会；3=看情况；4=可能会；5=肯定会
		阻止/举报非法捕捞的意愿	1=自己也可能去捕；2=不会；3=看情况；4=会当面劝阻；5=会报告执法部门
	实质标准	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	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

2.3.2 前因变量 借鉴现有量表测量标准和文献，结合退捕实践，本研究构建8个前因变量的问卷题项，评分为1(根本不符合)至5(非常符合)(表2)。通过18个题项衡量渔民韧性，积极态度参考心理韧性量表(CD-RISC)，衡量渔民坚韧性、乐观性和力量性；学习能力参考生计恢复框架^[27]，衡量渔民再就业新技能的获取能力；社会支持参考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衡量渔民社会连结性；网络协作参考人际关系能力问卷(ICQ)，衡量渔民整合人际资源和发展网络关系的能力。另通过13个题项衡量退捕渔民对生态补偿、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和产业帮扶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及认可度(表2)。

所有题项得分平均值表示前因变量水平。在进行验证性因子检验后，再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量表有较好的关联度(KMO值大于0.7)、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大于0.6)以及效度(AVE值大于0.5、CR值大于0.7)。相关性检验中，前因变量除社会支持外，其余与结果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各前因变量之间也存在显著关系。因此传统线性研究方法难以解释本研究问题，符合研究预期。

2.4 变量校准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使用fsQCA3.0软件进行直接校准法。通过直接校准法^[20]，将8个前因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确

表2 前因变量题项测量和信效度分析
Table 2 Antecedent variable measurement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研究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积极态度	我想方设法解决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问题	0.937	0.917	0.626	0.919
	我会冷静处理退捕过程中的问题	0.937			
	我最大努力克服退捕过程中的不顺利	0.924			
	我不怕现在工作中的困难，因为捕鱼时有很多经验	0.772			
	退捕中遇到不确定的事情，我一般往好的方面想	0.658			
	我做事情负责，能独当一面	0.618			
学习能力	我踏实肯干，能吃苦耐劳	0.603	0.810	0.523	0.813
	我学会新知识、新技能速度快	0.789			
	我一直自学、参加培训或者请教别人来提高技能	0.764			
	我能同时打好几份工，或者一份工作里同时处理很多事务	0.677			
社会支持	我能很快适应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内容和步骤要求	0.654	0.874	0.709	0.879
	亲属能为我的就业和发展提供资源、介绍门路	0.888			
	朋友能为我搭桥牵线，帮助我找工作	0.887			
网络协作	生活和工作中朋友常为我出主意，提供帮助	0.743	0.907	0.717	0.910
	我乐意与别人分享信息资源和经验	0.937			
	我喜欢请教不同的人传授经验和专业知识	0.925			
	我和新共事的人相处得都比较好	0.757			
生态补偿	我比较清楚新共事的人的业务特长	0.751	0.749	0.552	0.803
	退捕补偿程序明确且合理	0.942			
	渔船拆解补偿范围和标准确定	0.680			
	退捕渔民身份界定清晰合理	0.674			
社会保障	渔船拆解等补偿资金发放及时	0.636	0.898	0.812	0.896
	退捕社会保障范围合理	0.902			
职业培训	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等保障明确	0.900	0.894	0.699	0.902
	当地组织劳动和职业技能培训	0.904			
	当地组织上岸渔民专场招聘或就业信息	0.867			
	当地组织创业培训	0.804			
产业帮扶	当地就业帮扶政策明确且合理	0.762	0.821	0.616	0.827
	当地对养殖或种植技术有跟踪指导	0.851			
	当地有创业金融支持	0.760			
	当地特色产业帮助退捕渔民就业	0.739			

保每个变量的95%分位数（完全隶属）、50%分位数（交叉点）和5%分位数（完全不隶属）均被设置为锚点。这一过程可以确保在模糊集分析中，每个变量的不同取值能够准确地映射到相应的隶属度，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对结果的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渔民韧性、政策工具及退捕政策效果描述性分析

渔民韧性的量化范围为0.00~5.00，而湖南省渔民韧性的均值为3.65，表明渔民对制度变革后的新生活 and 再就业适应力尚可。总体上，渔民对“十年禁渔”的心理接受程度较好，并且退捕后与人共事和协作的适应能力也较强。然而，从亲属和朋友获得的帮助相对较少，学习新知识和适应新工作要求的能力不足。在县域间，渔民韧性差异不大（表3），

其中沅江市的均值最高为3.95，汨罗市最低为3.34，但在社会资本获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沅江市得分为3.93，浏阳市仅为2.67。

渔民对各项政策工具的认可度均值为3.89，表明普遍认同身份界定的标准，退捕生态补偿范围全面，补贴程序合理，资金发放及时。地方组织的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针对性强，积极帮扶渔民转产就业。各县域社会保障力度和明确程度尚可，但在结合本地特色产业或提供金融资金支持、种养殖技术跟踪指导上不足，产业帮扶均值仅为3.46。除标准化生态补偿外，各地因地制宜调整退捕政策重点。例如，君山区和桃江县重点关注社会养老等兜底保障，浏阳市、安乡县、南县则侧重劳动和就业技能培训。

从渔民视角看，政策效果的均值为3.22。其中，“长期退出捕捞意向”仅为1.92，“阻止/举报非法

表 3 县域层面渔民韧性和政策支持及退捕政策实施长期效果情况

Table 3 The resilience and policy support of fishermen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 long-term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ithdrawal policy

县域	渔民韧性				政策工具				退捕政策效果		
	积极态度	学习能力	社会支持	网络协作	生态补偿	社会保障	职业培训	产业帮扶	长期退捕	举报捕捞	生活幸福
安乡县	3.86	2.93	3.51	3.82	4.14	4.09	4.27	3.68	1.93	4.33	3.45
汉寿县	3.81	2.90	3.18	3.90	4.05	3.56	3.89	2.82	1.66	3.48	3.29
赫山区	3.90	2.96	3.19	3.87	4.22	3.83	4.27	3.48	2.30	4.56	3.19
君山区	4.26	3.35	3.52	4.14	4.30	3.98	4.03	3.40	2.10	4.65	3.55
汨罗市	3.76	2.74	3.30	3.55	3.86	3.21	4.04	2.95	2.33	4.43	3.19
临湘市	4.13	3.25	3.36	4.14	4.36	3.75	3.18	3.77	2.20	4.05	3.75
浏阳市	3.74	3.25	2.67	4.63	5.00	2.75	5.00	4.50	1.50	5.00	4.00
南县	3.98	3.06	3.57	4.02	4.34	4.06	4.23	3.78	2.10	4.41	3.61
桃江县	4.08	3.17	3.63	4.00	4.43	4.37	4.35	4.12	1.77	4.60	3.17
湘阴县	4.13	3.11	3.27	4.12	4.08	3.28	3.55	3.17	2.17	4.30	3.42
沅江市	4.33	3.41	3.93	4.00	4.28	3.96	4.32	3.71	1.59	4.23	3.57

捕捞意向”为 4.23,“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为 3.42。这表明:一是渔民对他人非法捕捞行为零容忍;二是退捕后由于收入骤减,渔民返捕意愿较强,长期退出捕捞意向不高;三是渔民受退捕新制度冲击,生活幸福感一般。通过 fsQCA 分析将进一步揭示渔民韧性和政策工具如何共同影响退捕政策效果。

3.2 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必须进行必要性检验。本研究发现,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 0.9,因此不构成必要条件。在后续的组态分析中,将保留这些变量^[20]。这表明单项前因条件对于解释退捕政策效果的力量较弱,长期效果更多地是多个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将案例阈值设置为 5,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21]。在 QCA 分析中呈现了中间解、复杂解和

简约解。鉴于中间解的覆盖度和一致性都超过了其他两种解^[21],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中间解,并辅之以简约解。最终得到了 4 类退捕政策长效的组态(H1、H2、H3、H4)和 4 类退捕政策实施低效的组态(L1、L2、L3、L4)。这些解的一致性分别为 0.807 和 0.816,均大于 0.8,解的覆盖度分别为 0.583 和 0.501,能够解释 50% 以上的案例数。以上结果表明,退捕政策的长期效果不仅受到单一变量的影响,而是由多个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

3.3 退捕政策效果的长效组态分析

根据退捕政策长效组态的核心条件及背后解释逻辑(表 4),本研究得出 4 条长效机制结果。

3.3.1 “积极态度-网络协作”主导型 H1 组态以积极态度、网络协作为核心条件,同时也突显了社会支持的缺失,包含 20 个案例。在这种组态下,渔

表 4 长效退捕政策效果组态分析

Table 4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long-term withdrawal policy

条件变量	H1	H2	H3	H4	
				H4a	H4b
积极态度	●	●		●	●
学习能力		●	○	●	●
社会支持	⊗		●	●	●
网络协作	●	●	●	●	●
生态补偿	●	●	●	●	
社会保障	●	●	●		●
职业培训	●	●	●	●	●
产业帮扶		●	●	●	●
一致性	0.838	0.839	0.882	0.862	0.868
覆盖度	0.427	0.457	0.306	0.389	0.390
唯一覆盖度	0.037	0.011	0.030	0.019	0.019
解的一致性			0.807		
解的覆盖度			0.583		

注:●表示核心前因条件存在,●表示辅助前因条件存在;⊗表示核心前因条件缺失,○表示辅助前因条件缺失,空格表示前因条件无关紧要。下表同。

民虽然缺少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资源帮助，但他们对退捕政策持积极态度，自身也具备踏实肯干的品质，再就业动机强烈。他们能够通过外部人际关系网络积极寻求就业机会，因此对外部退捕政策的支持依赖较低。

3.3.2 “学习能力-职业培训”主导型 H2 组态以学习能力、职业培训为核心条件，包含 20 个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能的能力较强，再就业动机强烈，能较好适应退捕后的工作。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例如开展职业培训和介绍职业和岗位，以拓宽就业渠道，发挥渔民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生计途径^[8]。该组态的典型案列大多来自南县的退捕渔民。南县政府对于有寻找生计意愿和再就业能力的渔民，积极推进“四轮驱动促就业”政策。他们建立了推荐就业平台、提升技能促进就业、扶持创业带动就业以及保障公益岗位的制度，通过点对点定向帮扶，为渔民群体提供了就业的途径和生计的保障，让他们成为制度变革的受益者。

3.3.3 “网络协作-产业帮扶”主导型 H3 组态以网络协作和产业帮扶为核心条件，包含 20 个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渔民虽然缺乏学习技能，但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良好的与人共事能力以及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政府应该为这些具有高协作能力的渔民提供精准服务，例如提供创业金融支持、养殖种植技术指导等，帮助他们整合家庭和外界的信息资源，从而实现收入增长。该组态的典型案列大多来自湘阴县的退捕渔民。湘阴县通过“农业全产业链”促进就地转业，加大了对退捕渔民的产业帮扶力度。依托湘阴特色农产品，他们大力支持稻渔种养、水产养殖生产、加工流通、休闲渔业等产业

的发展，推动了 169 个渔民就业创业项目的实施。这些长期的“嵌入式”项目使得渔民和渔村持续受益，创业能力增强，收入增加，进而提升了渔民的生活幸福度，更好地巩固了退捕政策的成果。

3.3.4 “学习能力-网络协作-政策联动”主导型 H4 组态以学习能力、网络协作、职业培训、产业帮扶为核心条件，体现了渔民韧性下学习能力、网络协作与政策联动的协同效应。由于辅助条件不同，分为 H4a 和 H4b，共同包含 40 个案例。在这种组态下，无论渔民对禁捕政策是否持积极态度，或者是否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只要当地政策能够保障渔民的基本权益并拓宽退捕后的生计就业渠道，渔民能够发挥自身学习新技能并扩展人际交往网络，其家庭社会力量和政策支持将共同提升渔民对退捕冲击的抵御能力。在该组态下，沅江市的退捕渔民案列数量最多。除了实施渔民退捕保障政策和开展转产职业培训外，沅江市还针对当地洲岛渔民居住不便和安全隐患问题，开展了整体搬迁与集中安置。他们强调政策的兜底作用，通过精准系统的解决渔民搬迁、就业以及洲岛生态修复和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让渔民们感受到生活的改善。

3.4 退捕政策效果的低效组态分析

考虑到 QCA 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即结果的出现和缺失条件是非对称的^[20-21]，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退捕政策效果的低效组态(表 5)。在组态 L1 中，职业培训的缺失是导致低效的核心因素，突显了为渔民提供职业培训的必要性。而在组态 L2 和 L3 中，积极态度、社会支持和网络协作的缺失共同主导，表明渔民的心理坚韧度和乐观程度、社会网络的连结度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对于构建退捕长效机制至关重要。至于组态 L4，学习能力和产业帮扶的缺失发

表 5 低效退捕政策效果组态分析

Table 5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an inefficient withdrawal policy

条件变量	L1	L2	L3	L4
积极态度	●	⊗	⊗	●
学习能力	●	○	○	⊗
社会支持	●	⊗	⊗	●
网络协作	●	⊗	⊗	●
生态补偿	●	○	●	●
社会保障		○	●	●
职业培训	⊗	⊗	●	●
产业帮扶	○	○	●	⊗
一致性	0.854	0.859	0.861	0.886
覆盖度	0.271	0.295	0.278	0.244
唯一覆盖度	0.061	0.083	0.073	0.030
解的一致性			0.816	
解的覆盖度			0.501	

挥着核心作用,即使渔民不反对退捕,但如果就业机会有限,退捕后收入减少,并且缺乏及时的帮助,都会影响政策效果。从组态样本的分布来看,L1至L4组态分别包含13、5、13和20个案例,分散在湘阴县、汉寿县、桃江县、南县和沅江市等县域中。

3.5 退捕政策效果组态比较分析

对长效和低效组态进行对比后发现,网络协作是核心条件。渔民主要依赖于朋友和亲属关系来获取外部支持,而这种社会网络的特点是紧密度高、趋同性高、异质性低,这容易导致渔民的边缘化^[30]。当渔民所在的社会网络缺乏对退捕政策的积极响应时,他们受到从众效应和群体精神的影响,因此对政策的认同度会降低,从而影响退捕政策的效果。同样,学习能力也是一个核心条件。由于大多数渔民的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且从事捕捞的年限较长,他们通过学习新技能来实现转产就业有时会力不从心。受限于农村学习渠道不够完善或培训体系不健全,以及农村学习氛围不够浓厚等现实原因的影响^[26],渔民的集体学习意识也相对较弱。一旦被迫停止捕捞生计,一些渔民可能会出现消极的情况,对退捕政策的积极性较低。

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在所有组态中都是辅助条件。各县的过渡期生活补助、渔船渔具和捕捞权

回收的补偿标准和程序基本上是统一的^[9],这些补偿政策作为禁捞政策的基础阶段的辅助性政策^[5,9],只能维持渔民的短期基本生活,缺乏持续性。社会保障政策虽然能够为渔民的健康问题或生活困境提供援助,但对于增加渔民长期收入的作用较小。

职业培训和产业帮扶则是核心条件。职业培训可以推动非渔业就业,如务农、临时工等替代生计。而精准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支持本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渔民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或创业机会。这两项政策推动渔民开辟新的生计途径,增加经济收入,提升生活幸福感,从而降低返捕意愿,积极参与退捕治理,顺利实现从“捕捞渔民”到其他身份的转变。因此,基层政府需要根据当地渔民的特点和需求反馈,调整退捕治理方式,重视政策的时效性,同时关注政策的中长期效果。

3.6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参考现有检验方法^[36-37],将案例频数从5提高到6重新进行组态分析(表6)。长效组态数量没有改变,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与原结果一致;低效组态由4条变为3条,解一致性有所提高但覆盖率下降。总体来看,经过稳健性检验的组态结果与表4、5的结果大体一致,这表明本研究样本异质性水平较低,原有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表 6 组态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of configuration

条件变量	H1	H2	H3	H4a	H5b	L1	L2	L3
积极态度	●	●		●	●	⊗	●	●
学习能力		●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
网络协作	●	●	●	●	●	⊗	●	●
生态补偿	●	●	●	●		●	●	●
社会保障	●	●	●		●	●	○	●
职业培训	●	●	●	●	●	●	⊗	●
产业帮扶			●	●	●	●	○	⊗
一致性	0.838	0.839	0.882	0.861	0.868	0.861	0.861	0.886
覆盖度	0.427	0.457	0.306	0.389	0.390	0.278	0.245	0.243
唯一覆盖度	0.037	0.011	0.030	0.019	0.019	0.096	0.067	0.041
解的一致性			0.807				0.830	
解的覆盖度			0.583				0.407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 长江渔民在应对“十年禁渔”带来的冲击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心理韧性,但不同县域间的渔民在社会网络资本上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大部分渔民认可十年禁渔政策,但退捕后家庭收入的急剧变化可能会影响其长期退出捕捞的意愿,降低其生活幸

福感。因此,从渔民角度来看,退捕政策长期实施的效果中等。

2) 运用 fsQCA 方法,结合南县、湘阴县及沅江市的典型经验,提炼出积极态度-网络协作、学习能力-职业培训、网络协作-产业帮扶和学习能力-网络协作-政策联动4类不同主导型的政策长效组态。第一类强调渔民主观能动性来响应退捕,第二、第三类反映渔民韧性与政策工具的适配组合,第四

类反映外部政策工具组合。

3) 退捕政策的长效与低效组态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关系。造成高低效组态的关键变量是网络协作与学习能力，二者对增强渔民韧性从而提升政策长期效果较为重要。政策工具实施上，职业培训、产业帮扶等为退捕治理长效机制打下基础；而生态补偿与社会保障均为辅助条件，治理效果有限。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为“十年禁渔”治理后续及其他农业生态环境政策变革的实施提出以下建议：

1) 重视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渔民作为弱势群体，受到农村保守和地域封闭的限制，其非正式社会关系易边缘化和趋同化。建立政府制度性支持不仅能扩大渔民人际交往网络，还能培养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提高渔民对公共政策措施的遵守程度。政府应引导农民建立资源共享观念，给予其获取社会资本、开展人际交往的机会，并在内部建立互助网络，实现自助与互助。具体措施包括指导社区开展特色集体文化活动，增加渔民的社会参与机会，提升获得感和归属感；通过农业合作社等组织提供更多关于行动者动机和可信度的信息，培养农户对群体福祉的关注。

2) 加强农村学习氛围的营造。渔民接受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会影响其韧性的构建，从而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升渔民的学习能力和水平，有利于他们了解禁捕带来的生态益处，提升其对退捕政策的认可度。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农民的学习意识和能力，完善农村教育和管理制度。具体措施包括送政策知识下乡、筹建农民图书馆等，以提升渔民的自我学习意识；为大龄退捕渔民提供适老化数字产品和服务，培养他们适应数字化农村社会的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转换身份。

3) 探索因地制宜的政策组合模式。农业政策的实施需注重次序并调整，利用产业、保障和帮扶等政策扩大受益群体。随着过渡期补贴即将结束，治理效果减弱。为维持生计的长期稳定，各基层应将重点放在渔民未来产业的职业培训上，提高其可雇佣能力，避免技能错配。针对低收入且就业意识强的渔民群体，开展“一对一”定向转产再职业培训，减少对社保收入的依赖；对高收入且适应能力强的渔民群体，则需传授创业技巧与经营理念，落实创业贷款政策，提供贴息创业担保贷款等。

参考文献：

[1] 李志军, 张毅.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演进、评析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3, 39(3): 158-171, 195, 172.

Li Z J, Zhang Y. Evolution,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3, 39(3): 158-171, 195, 172.

[2] 赵静, 薛澜. 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运用[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0): 39-60, 205.

Zhao J, Xue L. An exploration of the type matching and application of policy mechanism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1(10): 39-60, 205.

[3] Ciccio R, Lombardo E. Care policies in practice: How discourse matter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J]. Policy and Society, 2019, 38(4): 537-553.

[4] 高小玲, 邓江锋. 长江退捕渔民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层面研究——基于湘、皖渔民的有序 Logit-ISM 模型分析[J]. 中国渔业经济, 2021, 39(6): 8-19.

Gao X L, Deng J 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licy satisfaction of fishermen returning to fish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function level: Based on the ordered Logit ISM model of fishermen in Hunan and Anhui[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21, 39(6): 8-19.

[5] 何羽丰, 陈廷贵, 杨杨.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9): 210-220.

He Y F, Chen T G, Yang 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fishing ban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 43(9): 210-220.

[6] 庞洁, 靳乐山. 生态认知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8): 1870-1878.

Pang J, Jin L S. Impact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fishermen's willingness to quit fisher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Poyang Lake are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1, 30(8): 1870-1878.

[7] 高小玲, 刘盼. 就业政策、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安徽退捕渔民的调查[J]. 中国渔业经济, 2022, 40(2): 10-20.

Gao X L, Liu P. Effects of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informal norms on alternativ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fishermen withdrawing from fishing: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Hunan and Anhui[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22, 40(2): 10-20.

[8] 刘子飞, 韩杨.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 目标、进展与建议——基于长江禁捕典型省域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42(8): 42-51.

Liu Z F, Han Y. Policies on transferring fishermen's job on the Yangtze River: Target, progress and recommendations: Investigations on typical provinces with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 42(8): 42-51.

[9] 刘子飞, 于法稳. 长江流域渔民退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 改革, 2018(11): 108-116.

Liu Z F, Yu F W. Research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he fish withdrawal from the fishermen of Yangtze River[J].

- Reform, 2018(11): 108-116.
- [10] 何羽丰, 陈廷贵, 刘子飞等.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户生计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2): 311-323.
- He Y F, Chen T G, Liu Z F, et al. Impact of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on retired fishing households' livelihoods in Yangtze River[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3, 32(2): 311-323.
- [11] 陈军亚. 韧性小农: 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2): 82-99, 201.
- Chen J Y. Resilient small peasants: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energy and autonomous responsibility of small peasants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9(12): 82-99, 201.
- [12] Jones L, Tanner T. "Subjective resilience": Using perceptions to quantify household resilience to climate extremes and disasters[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7, 17(1): 229-243.
- [13] Darnhofer I, Lamine C, Strauss A, et al. The resilience of family farms: Towards a relational approach[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4: 111-122.
- [14] 张雄, 赵丹维. 韧性治理在农村社会风险治理中的适用性问题探析[J]. 领导科学, 2022(11): 101-105.
- Zhang X, Zhao D W. Analysis on the usability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in rural social risk governance[J]. Leadership Science, 2022(11): 101-105.
- [15] 唐任伍, 郭文娟. 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J]. 改革, 2018(8): 64-72.
- Tang R W, Guo W J. The evolution resilience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Reform, 2018(8): 64-72.
- [16] 翟绍果, 张星. 从脆弱性治理到韧性治理: 中国贫困治理的议题转换、范式转变与政策转型[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 74-81.
- Zhai S G, Zhang X. From fragile governance to toughness governance: The issue transition, paradigm shift, and policy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poverty governance[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21(1): 74-81.
- [17] 雷晓康, 汪静.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0(1): 92-99, 159.
- Lei X K, Wang J. Implementing path and promoting strategy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0(1): 92-99, 159.
- [18] 李博. 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中的韧性治理[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4): 172-180.
- Li B. Analysis on the resilience governance and the path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poverty areas in the post-poverty era[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20(4): 172-180.
- [19]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 Du Y Z, Jia L D.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 new way of management resear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7(6): 155-167.
- [20]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21]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 [22] Barnes M, Matka E, Sullivan H. Evidence, understanding and complexity[J]. Evaluation, 2003, 9(3): 265-284.
- [23] Holling C S.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J]. Ecosystems, 2001, 4(5): 390-405.
- [24] Yang B, Feldman M W, Li S Z. The status of family resilience: Effect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rural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1, 153(3): 1041-1064.
- [25] Walsh F. Family resilience: A framework for clinical practice[J]. Family Process, 2003, 42(1): 1-18.
- [26] 张银, 李燕萍. 农民人力资本、农民学习及其绩效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2): 1-9.
- Zhang Y, Li Y P. Empirical study on farmers' human capital, farmers' learning and thei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0(2): 1-9.
- [27] 陈佳, 杨新军, 尹莎.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1): 150-157.
- Chen J, Yang X J, Yi S. Measures of the resilience, effe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ousehold poverty: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structur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1): 150-157.
- [28] 高远东, 李华龙, 宫梦瑶. 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资本与家庭收入差距[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7(4): 92-105, 228-229.
- Gao Y D, Li H L, Gong M Y.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income gap[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47(4): 92-105, 228-229.
- [29] Chen M K, Chevalier J A, Rossi P E, et al. The value of flexible work: Evidence from uber driver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27(6): 2735-2794.
- [30] 何丽娟, 童锐, 王永强. 社会网络异质性对果农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采用行为的影响[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1): 225-233.
- He L J, Tong R, Wang Y Q. Effect of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s on apple grow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replacing chemical fertilizer with organic fertilizer[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1, 30(1): 225-233.
- [31] 李俊青, 张雪莹, 袁博. 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人力资本误配[J]. 经济研究, 2023, 58(12): 167-184.
- Li J Q, Zhang X Y, Yuan B. Heterogeneit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mismatch of human capita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3, 58(12): 167-184.
- [32] 郑宇. 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 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与检验[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2): 141-161, 207.
- Zheng Y. An incremental equilibrium model of povert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experien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2(2): 141-161, 207.

- [33] 王思斌.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 - 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 [J]. 探索与争鸣, 2022(1): 110-118, 179.
Wang S B. The economic-social poli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resilient developm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22(1): 110-118, 179.
- [34] 张振宇, 范颖, 尤亮. 政府干预、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户福利不平等的影响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5): 1119-1137.
Zhang Z Y, Fan Y, You L.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welfare inequality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having transferred out farmland[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5): 1119-1137.
- [35] 张驰, 郑晓杰, 王凤彬. 定性比较分析法在管理学构型研究中的应用: 述评与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4): 68-83.
Zhang C, Zheng X J, Wang F B.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n configuration research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ield: Commentary and future directions[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7, 39(4): 68-83.
- [36]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 [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Zhang M, Du Y Z.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Position, tactics, and direc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9): 1312-1323.
- [37] White L, Lockett A, Currie G, et al. Hybrid context,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1, 58(3): 718-748.

(责任编辑: 孟岑)